

# 结构主义

〔法〕高宣扬——著

KHA Saen-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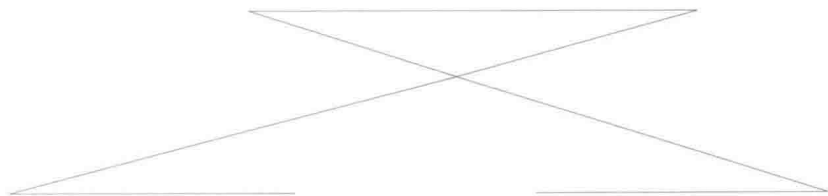
Structuralis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结构主义

[法] 高宣扬——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内容提要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列维-斯特劳斯和他所奠定的结构主义轰动了整个欧洲,逐步发展成一股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它不仅是哲学的,也是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学艺术的、更是实际生活经验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及历史新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本书从结构主义的渊源、形成及发展,综述它和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引导我们进入结构主义极具革命性的、丰富有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构主义 / (法) 高宣扬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高宣扬文集)  
ISBN 978 - 7 - 313 - 17155 - 9

I. ①结… II. ①高… III. ①结构主义(哲学)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1395 号

## 结构主义

著 者: [法]高宣扬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21 - 64071208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53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13 - 17155 - 9/B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 - 6818063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14ZDB018)研究成果



高宣扬教授一家与列维-斯特劳斯伉俪合影于巴黎,1990年2月14日。



《结构主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

## 高宣扬文集总序

当我个人生命创建第七十环年轮的时候，我幸运地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队伍的一员，使我的学术生命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我的生命也由此获得新的可能性，上演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命乐曲。所以，我在交大“学者笔谈”上发表题名为“新鲜的交大人”的感言：“历史总是把我们带领到远离故乡的世界尽头，但有时又突然地把我们带回故居和出发点。历史使我们学会了感恩”。其实，生命永远是在自我给予和接受给予的交互往来中延伸，所以，感恩始终伴随着生命自身，构成了生命交响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生命的价值及尊严奠定本体论和伦理基础。

生命是一部无人指挥的交响乐，自创自演，并在不同的社会遭遇和生活历程中一再地自我协调，演奏出一曲又一曲美丽动听的自然乐曲，弹奏出每个人在社会、文化、历史中的不同命运，演播成充满悲喜交织的无数千变万化的生命故事。

我的书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的自我展现。每一本书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不同阶段的生命故事。生命的故事千差万别，归根结底，无非就是生命对自身生长发展的自我关注，都是由生命内在创造力量与周在世界各种因素相遭遇而交错形成的。生命在自我关注的过程中，

总是以顽强的意志和万种风情，一方面激励自身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悖论困境中脱颖而出进行创造更新，另一方面严肃正视环绕生命的外在客观力量，自然地要对自身的命运进行各种发问，提出质疑，力图寻求生存的最理想的优化状态，从而有可能逐步演变成哲学性的探索，转化为生命的无止境的形而上学的“惊奇”，对生命自身、对世界万物、对历史以及自身的未来前景，进行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反思。

从学习哲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牢记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就是一种好奇”的教诲。从1957年以来近60年的精神陶冶的结果，却使我意识到：“好奇”不只是哲学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一切生命的生存原初动力。因此，对我来说，生命的哲学和哲学的生命，就是血肉相融地构成的生命流程本身。

生命的反思虽然表达了生命成长的曲折复杂历程，隐含着生命自身既丰富、又细腻的切身感受，但绝不会封闭在个人狭小的世界中，也不应只限于文本结构之中，而是应该置于人类文化创造的生命运动中，特别是把它当成人的生命本身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从生命的内与外、前与后，既从环绕生存的各种外在环境条件的广阔视角，又从生命自身内在深处的微观复杂的精神状态出发，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试图记录一个“流浪的哲学家”在四分之一世纪内接受思想文化洗礼的历程，同时也展现对我教诲不倦的国内外师长们的衷心感恩之情。

最后，我还要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的是刘佩英女士和刘旭先生，他们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高宣扬

2016年4月8日



## 2017 年新版序

一般地讲，每一个存在、每一本书、每一个思潮、每一个哲学理论，都有其自身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奇特性，每个生命以其自身个体的奇特性展现出妙不可言的生动故事，使生命本身显示自身珍贵的唯一性。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宣扬文集》总序中说，“我的书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的自我展现，每一本书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不同阶段的生命故事”。

实际上，不只是我的书，世上其他所有的书，其他所有的事物，作为个体的存在，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故事。正是生命及其故事的唯一性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交换的至高无上价值，使生命自身从诞生的时候起，就由此获得崇高的尊严，既显示出生命无与伦比的个体性，昂然耸立于世间，又展现其无限发展的前程及其引人入胜的故事，呈现出生命个体的独一无二性。

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生命生成过程活生生的实录，都是生命自身由其存在付出的努力所凝结的历史的再现。这些故事聚结了生命的自我创造经验，同时也分享生命本身的内在感受及能量，生动地记载了

生命本身所饱尝的苦与乐，也有能力靠其自身分有的能量而独立存在，并在一定情况下重新出发，再次生成其自身的生命新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生命故事中最精彩的情节，往往发生于生命生成时空维度的各个瞬间，或更确切地说，发生在各时空复杂网络的夹缝中。这些生命中难以估算的各种瞬间，都是突然出现在生命的一刹那，具有无限的伸缩潜力，可以成为一生中值得永远怀念的动人故事的原发点。实际上，它的出现由不得任何人的主体性的意愿，总是当生命展现到一个特定的时刻，才在生命内外各种张力的较量中涌现出来。

拙著《结构主义》，就是在我个人生命历程发生转折的1978年问世，它像我的“孩子”，自问世的那一刻起，就有它自己的生命，有它自身的历史。

当我在1978年春天离开中国大陆临时移居香港时，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发生了“变形”：经历自1966年至1976年连续十年的“隔离审查”，身体长期在暗无天日的隔离室内，已经被折磨到极度虚弱的程度，在抵达香港时，我又干又瘦的脸颊上，黑镜框的近视眼镜所透露的，是一双无神的眼睛，唯有眼镜下那个对称的黑褐色“蝴蝶斑”非常起眼，医生告诉我，那是身患肝炎的明显标志，而我却一直不知道自己已患上肝炎。

与身体的憔悴枯瘦相反，我在精神上却充满活力，受压抑十年之久所积聚的灵感，已迫不及待地要进行创造，自踏上香港境界的那一刻起，在香港的自由阳光照耀下，自然难以控制地熊熊燃烧起来了，促使我每天不知疲倦地阅读与写作。这也就是说，从大学毕业起怀抱的创作渴望，经多年沉默的思想积淀，在被隔离审查阶段处于“冬眠”状态的思想 and 生命激情，一旦冲出被隔离的牢笼，便即刻转化成强大的创作能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时地变成为物质力量，使我的生命处于亢奋状

态,早已把身体方面的疾患忘却得一干二净,以致未经治疗的隐形肝炎居然在一个月内奇迹般消失,蝴蝶斑不复存在了,使我恢复如初,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愉悦、快乐与幸福!

显然,在被隔离而失去自由长达十年之后踏入香港,有幸让我享尽自由的创作气氛,使我从“带有肝炎传染病菌的文化患者”,顿时转变成生气勃勃的思想创作者,简直就重演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化带菌者”“伤寒玛丽”(Typhoid Mary)的悲剧<sup>①</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拙著《结构主义》一书的诞生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文化带菌者”同结构主义思潮相遭遇而编织出来的故事。

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领域,因“思想异端”而受尽折磨的人物不胜枚举。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因“毒害青年”的罪名笑饮毒鸩;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因信仰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1473—1543)的日心说而遭受火刑;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吸取了先辈们的教训,机智地采取灵活策略,逃过教会的迫害,使四百年之后的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在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中以诙谐的语句赞赏说:“从某种意义上,伽利略做得对,为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sup>②</sup>,加缪由此得出哲学结论说:“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Il n'y a qu'un problème philosophique vraiment sérieux: c'est le suicide)<sup>③</sup>,接着,他说:“事实上,决心到达目的地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怎么走是不重要的”(C'est qu'en vérité le chemin importe peu, la volonté d'arriver suffit à tout)<sup>④</sup>,“在一个人的心中,只要充满着朝向高山顶峰的斗志,就足够了,我们应该把西西弗斯想象成乐观的西西弗斯”(La lutte elle-même vers les sommets suffit à remplir un cœur d'homme. Il faut imaginer Sisyphe heureux)<sup>⑤</sup>。

当存在主义浪潮泛滥于西方社会而使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被冠以“毒害青年”的罪名时,他曾经辩解道:“有人指责我毒害青年,然而,他们的真正意图,就是掩盖造成这种堕落的社会原因。他们受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寻找某位集许多普遍原因于一身的个人,把某个作家(我)当做替罪羔羊,却置集体社会因素于不顾。如果我果然相信一个作家可以引起青年自杀,那我将感到非常荣幸,因为这说明他同样可以阻止自杀。然而我无法相信这两种说法,在我们社会里,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一本书不可能具有直接的害人作用”<sup>⑥</sup>。

显然,我们可以从萨特的辩护中看到,他反对夸大思想的消极社会效果,人们对“某种思想”的可怕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戒备心理,从根本上说,是杞人忧天,或者说,它仅仅是一个便利的标签,一个借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或仅仅出于权力运作的方便,因为思想本身并不能像病毒那样直接作用于身体,引起死亡。

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才发明了“文化带菌者”的标签,其目的不是为了治疗或保护社会群体的健康,而只是为了找到控制思想创造的借口,以便让握有权力的人达到其自身的目的。

“文化带菌者”这一隐喻,源自“伤寒玛丽”的悲惨经历。“伤寒”(typhoid fever)原本是由伤寒杆菌(*Salmonella typhi*)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会伴有持续的菌血症与毒血症,在部分患者身上会长出玫瑰斑,卡夫卡曾经在他的小说《乡村医生》里描述了长出玫瑰斑伤口的患者身体<sup>⑦</sup>。

被指控的文化带菌者玛丽,原名玛丽·梅伦(Mary Mallon),生于爱尔兰,并于1884年移民美国。时龄仅15岁的玛丽,迫于生计,当起了佣人,为主人洗衣、做饭、看孩子,但她很快便发现了自己有烹饪的才

能，于是果断转行任厨师。然而，这份工作选择却使她在无意识中成为震撼欧美社会的“文化带菌者”的最早标本，因为伤寒杆菌在不知不觉中侵入她的身体，让她的厨师身份顿时失去正当化的基本条件，也使她陷于被隔离的境地。

尽管如此，玛丽的身体却出奇的健康，尽管她拒绝承认自己是病菌携带者，抗拒当地卫生官员和警察的抓捕，但最终还是被警察抓进了救护车送去医院体检，被押送到纽约附近名为“北边兄弟”小岛上的传染病房。但在被隔离两年后，也就是1909年，40岁的玛丽依旧健康地活着，于是便向美国卫生部门提起申诉。同年6月《纽约美国人报》大篇幅报道了玛丽事件，舆论哗然，卫生部门被指控侵犯人权，次年2月，当地卫生部门与玛丽达成和解，以玛丽不再从事厨师为条件，解除对她的隔离，玛丽表示同意。

但是，这个结局只是暂时的。五年之后，纽约一家医院再次爆发伤寒病，并且两人因感染而死亡，卫生部门在厨房里发现化名为“布朗夫人”的厨师，其实就是改名换姓的玛丽。于是，玛丽又回到了隔离区，直至1938年去世，年仅69岁。但验尸报告奇迹般显示：她体内虽然存有大量活体伤寒杆菌，导致她的真正死因却非伤寒，而是肺炎，换句话说，受指控隔离玛丽的缘由，是可以传染他人致死的伤寒病菌，但真正杀害玛丽的却是她因被隔离而患上的肺炎。

在玛丽的遭遇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和她一样，首先是作为“移民”而辗转流浪，对我隔离审查时经常“敲打”我的“罪名”之一就是“回国别有用心”，后来又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身患传染病，被强制性冠以“外来带菌者”、“散布思想毒草”的莫须有罪名被隔离了十年。

不同于玛丽的地方，只是在于：第一，我是在1952年作为华侨身份而移民回国的；第二，在被隔离审查时，我始终抱着“相信党”和“相信

群众”的信条,主动“坦白”我所做的一切,虽然结果仍然在我的个人档案内让我戴上“犯严重错误”的帽子;第三,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全体研究人员,在1969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押送到河南省最贫困的息县,在那里的“五七干校”,在盐碱浸泡多年的不毛之地,被强迫劳动两年;第四,1971年家父身患脑溢血在杭州老家去世时,我被剥夺回家奔丧的权利,血浓于水的父子情,硬被强力割裂,让我遭受了一生中最悲痛的精神折磨;第五,于1968年出生,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由军宣队交给了保姆,受到保姆的虐待,当我和我的太太经受十年审查之后,女儿和我一样身体又干又瘦,身患疾病;最后,我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70年代末,是在“伤寒玛丽”事件发生后的半个世纪,而这一时期也是西方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代。

抵达香港后,我仔细分析了在我被隔离时期的历史文化特征。我发现,当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地进行“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发表了《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sup>⑧</sup>,1960年中国发生经济困难时,萨特发表《辩证理性批判》<sup>⑨</sup>,发生了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也开启了1968年法国及整个欧洲学生运动的思想序幕。在我被隔离审查的十年中,也就是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理论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候:他的四卷本《神话学》<sup>⑩</sup>以及《原始思维》和《结构人类学》第二卷<sup>⑪</sup>等陆续出版,结构主义思潮处于鼎盛阶段,带动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转折和诠释学转折,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个面目焕然一新。

在同一时期内,受结构主义思潮启发而形成的“解构主义”、“建构主义”以及新符号论思潮,也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发展起

来,当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等人在我受审查的 20 世纪 70 年代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学术界对他们的思想理论毫无所知,当时接待他们的中方工作人员,只把他们当成西方记者代表团的成员来接待<sup>⑩</sup>。

这也就是说,由于“四人帮”的野蛮封锁,即使结构主义思潮的使者已经悄无声息地敲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大门之时,我们却仍然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问题及其争论置若罔闻,而且,更严重的是,当时我们的整个教育研究机构受到严重破坏,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反倒成为冠以“传播思想毒素”的罪名的理由。

历史是无情的,越不尊重历史,历史所给予的惩罚就越重。当我们无视历史、歪曲历史的时候,历史本身却恰恰成为最不可征服的无形力量,敲打着我们封闭的心灵,迫使我们深思,从自我欺骗的梦魇中苏醒,认清形势,追赶已经错过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更强的反省动力,重新调整我们自己在人类思想文化历史中的地位。

当然,结构主义也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生命。结构主义不只是在中国,即使在国外,也是经历曲折的过程之后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并又以多种方式,被人们诠释成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演变成为各种不同的思潮而传播开来。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至今已经流行半个多世纪,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哲学理论,却远没有被人们深入研究,更没有被正确理解和运用。为此,趁《结构主义》新版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我再次强调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及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结构主义发展的曲折性,从学术上看,是与它的跨学科性质以及它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冲击有密切关系。所以,当我们重新评价结构主义的时候,必须扩大学术视野,不仅要尽可能地重温已经被遗

忘的历史,而且还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认清现代化和全球化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要求,根据现代化和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把握结构主义所隐含的历史价值。

结构主义主要发源于语言学和人类学,接着,它由语言学和人类学同时扩展到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结构主义以如此迅速和宏大的规模强烈地影响到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及艺术,恰恰表明它的形成以及由它引领的理论范例变革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结构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它从人类历史的总体宏伟角度,站在跨民族和跨国家的高度,重新探讨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以及思想文化更新的基本模式,同时,结构主义还不满足于宏观地探索人类文化的创建机制,它还特别关注不同时代中推动着各种思想文化发生变动的动力基础,并以新的论述模式,取代原来西方传统思想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主体中心主义原则,直接向近四百年来试图占据全球文化霸权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发出挑战。

首先,列维-斯特劳斯所发展的结构主义是对近现代欧洲政治和文化中的种族主义的批判。针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种族问题》(*The Race Question*)一书中,发表《种族与历史》一文<sup>⑬</sup>。接着,列维-斯特劳斯尤其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集中论述了这一重要观点<sup>⑭</sup>。列维-斯特劳斯反复强调:所谓“野蛮”(sauvage; savage)的思想并不野蛮,“野蛮”的思想与“文明”的思想,不管出现在何处,都属于共同的人类思想,都一样是人类文明。由此也可以看出,结构主义之所以在其结构主义理论中突出人类历史的“共时性”(synchronie),正是说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和一体性,也为了对抗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者借用



以“历时性”(diachronie)的核心概念来分割历史,并由此区分各族历史的先后性,“论证”西方以外各族历史及其文化的“落后性”。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出现不只是标志着现代人类学的一个转折,而且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转折,它试图结束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地位,也宣告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到来。

结构主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要求人们从广阔的视野,寻求能够把各种文化现象当成可理解的相互关系网络,从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一个有可能把它们当成相互联系的总体的视角,统一地理解和分析人类文化各个方面及其表现的共同基础。

正因为这样,结构主义的新思考模式及其论述模式,彻底地颠覆了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人”的传统观念的“标准化”及其“正当性”基础,也试图揭示隐含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推动人类文化创新的深刻奥秘<sup>⑮</sup>。

所以,在20世纪中叶,结构主义之所以成为法国当代思想革命旋风的启动者并非偶然。在结构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理论和思想革命风暴的深层矛盾及其开辟新思路的潜在条件。

回顾法国与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近一个多世纪的变革过程,不难看出:变革的焦点逐渐地集中到对于主体中心主义原则的重新评估。主体中心主义原则是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时代确立的。正如受结构主义影响的福柯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整个系统及其历史,可以用“真理游戏”(jeu de vérité)来概括,其主要使命,就是集逻辑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于一身,鼓励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建构自身主体性为终极目标,力图使人的思想活动环绕着